

西方著名社会学家思想研究丛书

FAMOUS WESTERN SOCIOLOGIST SERIES

丹尼尔·贝尔：

后工业社会的观念

王小章 著

丛书主编 冯钢

Daniel Bell

浙江大学出版社

DANIEL BELL

丹尼尔·贝尔：

介入的观念

王小章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丹尼尔·贝尔:介入的观念/王小章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4

(西方著名社会学家思想研究丛书)

ISBN 7-308-02303-6

I. 丹... II. 王... III. 社会学家-思想评论
IV. C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1565 号

责任编辑:曾建林

装帧设计:张 磊

丹尼尔·贝尔:介入的观念

王小章 著

*

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杭州玉古路 20 号 邮政编码 310027)

(E-mail:zupress@mail.hz.zj.cn)

浙江大学出版社电脑排版中心排版

浙江印刷集团公司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 * *

850mm×1168mm 32 开 5.5 印张 138 千字

2000 年 4 月第 1 版 200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2000

书号:ISBN 7-308-02303-6/C·164

定 价:9.80 元

总 序

学术的发展,并不是一个单纯的逻辑过程,并非像一般人们想像的那样是对一个客观实在循序渐进的发现,且不断往其中添加新内容的过程。学术发展,正如熊彼特所说,是我们与自己以及我们前人头脑中创造的东西进行无休止搏斗的过程,每一个进步都是在新思想和新需要的冲击下,受着新一代人的偏好与气质的支配。因此,任何对学术现状的把握实际上都是在把握为历史所规定了的方法、问题和结果,只有对照其所由产生的历史背景来考察才会有意义。换言之,任何时候的任何学术状况,都隐含着它过去的历史背景,如果不了解这种隐含的历史,就不可能真实地表述这种学术状态。

因此,就思想或学术而言,了解其历史最有效的途径,应该说就是认识经典。当然这并不是说经典就构成了思想史或学术史的全部,而是说,经典以最浓缩的形式承载了历史上不同时代人类思想与智慧的积淀和结晶。具体落实到社会学这个领域,结识自这门学科正式诞生以来一个半世纪的历史中的那些新老大师们,体验他们对现实的感受方式,了解他们认识观察其所处社会的视角和方法,熟悉他们的观念和思想,对于今天的社会学学术事业的健康发展,对于今天的社会学者们认识研究其所置身的社会,应该说同样也是大有裨益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环

节。而这，可以说，正是我们这套丛书的初衷所在。

如果说，社会学的基本宗旨是对人类社会及其运行规则或状况的认识、探索和反省，那么，经典文本(classic text)就是这些新老大师从其特定的立场、问题出发对其所处的特定社会进行认识、探索和反省的结果。因此，就会有这样一个问题：这种从特定的立场、问题出发的对特定社会所作的认识、探索、反省，是如何与我们今天的社会生活相关联的？换言之，那些基于特殊性的文本如何显示出它超越特殊性的意义？这里牵涉到对于文本的两种解读方式。P. Ricoeur 曾对言说话语和书写文本作过一个区分，他认为，言说(speech)是一个事件，而书写下来的不是言说(saying)，而是所说(said)，因此，通过书写，作者原本的旨意和文本的意义不再完全契合，文本的命运开始独立于作者的生涯，文本也独立于言说的直接指涉。由于文本和言说的这种区别，就产生了对文本的两种不同倾向的解读方式：一种是高度情境化(hypercontextualisation)的解读方式，另一种是去情境化(decontextualisation)的解读方式。前者力图从作者所处的(也即文本所由以产生的)具体社会情景和脉络中来理解把握文本，尽可能将文本还原为作者的言说，从而领会作者的本意；后者则与此相反，解读者倾向于从自身的问题关怀出发，超越文本所产生的具体的、特殊的社会情景和脉络，从中抽象出较具普遍性的、可以移置并洞亮其他社会情境的内在理路。我们认为，第一种解读方式可以驱除由于时间和空间的隔阂而笼罩于文本之上的尘埃迷雾，第二种解读方式则可以使产生于其他时空中的文本联系于当下的现实生活。

当然，需要说明的是，从总的倾向上看，这套丛书的作者所采用的主要是第一种解读方式。原因其实也很简单，第一种解读方式是第二种解读方式的前提和基础；在不理解或误解作者原

旨的情况下即对文本进行普遍性的抽象或直接套用、移植文本中的术语、概念,如此郢书燕说的结果,往往会是张冠李戴、变桔为枳,从而发生怀特海所说的“错置具体感”的谬误。况且,就第二种解读方式而言,它往往受到解读者所关注的具体问题和所由出发的立场的影响。因此,作为这套丛书的作者,在认真完成第一种解读之后,大可以让读者从他们自己的具体感出发进行第二种解读,这样,至少也可以使我们免除越俎代庖之嫌。

目 录

第一章 从“雾都孤儿”到知识精英	(1)
一、贝尔其人	(3)
二、价值取向	(8)
三、社会学方法论	(14)
第二章 阶级·政治·意识形态	(22)
一、阶级	(24)
二、政治:美国的左翼、右翼和中间派	(30)
三、意识形态的终结	(45)
第三章 后工业社会	(57)
一、观念的由来	(58)
二、后工业社会面面观	(63)
三、服务社会、知识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政治	(71)
四、后工业社会的社会选择和社会计划	(86)
第四章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101)
一、三领域之间的对立	(105)
二、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历史根源	(111)
三、现代主义	(126)
四、宗教复兴和“公众家庭”	(136)
结束语	(153)
后 记	(162)

第一章

从“雾都孤儿”到知识精英

在当代西方社会学界,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可以说不属于任何一个学派,但是,正因其思想风格、学术视角的与众不同,因而,如果有一套旨在比较系统地介绍西方具有代表性的社会学思想大师的系列丛书而不把他包括进来的话,无疑将是一个严重的漏失。自本世纪50年代以来,贝尔不断地以其别具一格的思想言路和对当代社会变迁脉搏的敏锐把握而为社会学这门学科注入新的活力,并以纵横捭阖之势对社会学中结构功能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经验主义的等传统作出颇具挑战性的回应,从而在相当程度上引导着社会学思想的发展方向。当然,应该马上指出,贝尔的影响并不止在社会学这一专业的领域,而且还广泛地弥散于几乎整个当代西方文化思想界。下面的调查可以见贝尔的影响之一斑:在1972年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卡杜辛(C. Kadushin)教授主持的全美知识精英普测中,贝尔曾以高票名列30位影响最大的著名学者之首,而位居他身后的则有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约翰·肯尼斯·加尔布莱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埃德蒙·威尔逊(Admund Wilson)以及史学家理查德·霍夫

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大作家索尔·贝娄(Saul Bellow)、纽约文人圈的元老、贝尔的前辈里奥耐尔·屈瑞林(Lionell Trilling)等等知名的知识分子,而其他几位也相当著名的社会学家,如阿尔弗雷德·舒茨(Alfred Schutz)、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等,则榜上无名。

当然,学者的公众知名度有时也可以通过哗众取宠、迎合公众而取得,尤其是在大众传媒如此发达的今天。但贝尔的影响却来自他那种营造和操作旨在刻画和把握长时段的社会变迁方向的“大观念”(big idea)的能力以及体现在对这些大观念论述中的对人类未来命运的深切关怀和操心。当社会学这门学科在美国越来越趋向于空疏抽象、大而无当和琐细的实证这两个极端,越来越失去它在马克思、韦伯等人手中时的那种精神魅力时,贝尔却在其著述中倾注了他对于人类精神境况、社会文化,对于人类未来命运的执着关切。贝尔的这种关切和操心集中地体现在他所提出的一系列“大观念”中。在当代西方社会学中,贝尔的名字和三个深具影响的“大观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们便是:意识形态的终结(the end of ideology)、后工业社会(the post-industrial society)和资本主义文化矛盾(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虽然这些观念一直处于争议之中而没有被其他学者完全接受,但是,一个无庸讳言的事实是,它们已深深地嵌入了当代社会学思想乃至整个社会文化思潮,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当代社会思想的发展演变方向,以至于今天谁若想分析探讨当代社会文化的变迁态势就很难绕开丹尼尔·贝尔,特别是上述三个观念。本书对丹尼尔·贝尔的介绍即以这三个大观念为中心。但在正式介绍之前,我们不妨先来看一下贝尔的生平及其思想学术活动的大致轮廓。

一、贝尔其人

贝尔于1919年出生于纽约一个东欧犹太移民家庭。在贝尔出生尚只有8个月时,父亲便撒手人寰,自此,他便和姐姐们随着寡母艰辛度日。为了应付生活,母亲不得不从事全日制工作,小贝尔白天便只好被寄托在一家犹太孤儿院里。在贝尔11岁时,他的叔父萨缪尔·波洛斯基(Samuel Bolosky)成了他新的监护人。波洛斯基是贝尔家族原来的姓,由于贝尔的叔父认为这个姓氏会有碍于他这个牙科医生事业的发展和社会地位的提高,于是才和家族其他成员商定改姓贝尔。犹太孤儿院的生活,穷街陋巷里的经历,切身所感的排犹倾向和文化同化的压力,亲眼目睹的贫富悬殊的社会现状,贝尔早年作为犹太移民的后裔在成长过程中所体验到的这一切,加上30年代的经济危机和革命运动,促进了他心智的早熟,也深深地影响了他的思想和价值倾向。13岁那年,他读了辛克莱(Upton Sinclair)的小说《丛林》,随即便向他的老师宣布他已发现了真理并不再信奉上帝,继而又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the Young People's Socialist League)。这期间,他阅读了大量关于社会主义的书籍,也开始接触社会学。他既为托洛斯基的思想所诱惑,又为斯大林主义所激动。但当他读了他的几位信奉无政府主义的表兄推荐给他的叙述喀琅施塔特事件的小册子,包括伯克曼(A. Berkman)的《布尔什维克的神话》(*The Bolshevik Myth*)、《关于布尔什维克的真相》(*The Truth about the Bolshevik*),古德曼(E. Goldman)的《喀琅施塔特的反抗》(*The Kronstadt Rebellion*)等,了解到托洛斯基和季诺维也夫怎样残酷地以武力镇压1921年喀琅施塔

特的海军兵变之后,他便决定要做一个民主社会主义者。1935年,贝尔进入纽约城市学院学习,在那里,他加入了一个叫做“凉亭一号”(Alcove No. 1)的社会主义阅读小组。与该小组的其他成员——包括梅耶·拉斯基(Meyer Lasky)、伊利文·克里斯多(Irving Kristol)、奈瑟·格莱泽(Nathan Glazer)等——不同的是,贝尔虽然也几乎逐字逐句地阅读了马克思的差不多所有著作,但他始终反对暴力革命。对于这一倾向,贝尔1981年在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时曾借用韦伯关于“责任伦理”和“终极目的伦理”的区分而作了解释。和韦伯一样,贝尔认为,要同时坚持“责任伦理”和“终极目的伦理”是难以实现的,而“责任伦理”则可以在解决既存的冲突时将牵涉到的各方所蒙受的损害控制在最小限度内。贝尔倾向于“责任伦理”^①。

1938年,贝尔毕业于纽约城市学院。随即又到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呆了一年。此后的20年中,贝尔主要活动于新闻界。先是供职于《新领导人》杂志社,并于1941~1944年担任该杂志的总编。既而在芝加哥大学担任了三年社会学教员之后又于1948~1958年间担任《命运》杂志的编辑。这些作为报刊编撰人的经历一方面使贝尔深入地了解了现实的政治斗争,另一方面也锻炼了他敏锐感知现实和迅速写作的能力。据他自己估算,在1948年以后的20年中,他总共写了426篇文章,其中许多都是长文。60年代以后,贝尔的主要精力投入了学术生涯,但是,他作为报人的才干和热情并没有丢失,这集中地反映在1965年他和伊利文·克里斯多共同创办的《公众利益》杂志和他作为《党派评论》杂志编委的工作中。

^① Daniel Bell, *First Love and Early Sorrows*, in: *Partisan Review*, 1981(4), pp. 532~551.

如前所述,在贝尔先后担任《新领导人》和《命运》两杂志编辑工作之间的1945~1947年间,他曾于芝加哥大学担任过三年的社会学教员;此后,在其担任《命运》编辑的时候,他又于1952~1956年间作为社会学讲师兼职于哥伦比亚大学。但是,贝尔正式的学术生涯却开始于1958年他退出《命运》杂志社而就任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副教授之后。1960年,贝尔于该校获得博士学位,新闻人、学者的两栖生涯使得他获得博士学位时已经41岁了;1962年,他升为正教授。1969年,贝尔又转任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1980年,成为该校亨利·福特二世社会科学教授,直至1990年退休。

在潜心学术的同时,贝尔并没有把自己彻底封闭在象牙塔中而忘怀窗外的风云世事。事实上,怀着对早年生活经历的刻骨铭心的记忆的他是不太可能置身世事之外而去从事超然脱尘的纯学术研究的。正如本书的书名所提示的那样,贝尔是一名“介入型”的学者,而他的“介入”,首先当然体现在后面我们将要介绍的他的那些思想观念之中(他的那些观念本身即是对他所置身的社会时代进行把握和引导的努力,是他参与社会、投入时代的体现,所以有人就把他的理论称为“介入理论”^①),但同时也体现在作为新闻人的活动中,体现在他在执教于讲台、撰文于书斋的同时,还积极地直接投身于许多旨在改造和规划社会及其未来发展方向的公共机构的活动。贝尔曾先后任职于许多公共机构,以自己的学识积极参与公共事务:1964~1966年,他是美国技术、自动化和经济发展总统委员会(the President's Commission on Technology, Automation and Economic Progress)的成员;1964~1974年,他是美国艺术和科学院下设的2000年

^① 宋林飞,《西方社会学理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八章。

委员会(Commission on the Year 2000)的主席;1976~1979年,他担任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的(OECD)国际未来计划(Inter-future Project)美国代表;此后,他又成为80年代国家议程总统委员会(the President's Commission on a National Agenda for the 1980s)的成员,并担任其能源和资源分组的主席;贝尔还是美国电子通讯和计算机研究国家委员会(the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Board on Telecommunications and Computers)的成员。

当然,作为一名杰出的学者和思想家,贝尔最主要的也最得心应手的工作自然还是写作和著述,他对现实社会的介入也主要是思想的介入、观念的介入,而不是行动的介入,或者说,向世人宣示他的思想观念的撰述就是他最主要的行动,是他最主要的介入手段。而他的巨大的影响也主要来自他那等身的著作。除了大量零散的文章,贝尔结集出版的著作主要有:《意识形态的终结》(*The End of Ideology*, 1960年初版,1988年新版新序)、《美国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Marxian Soc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最初于1952年发表于由D. Egbert和S. Persons主编的《社会主义和美国生活》一书,1967年出版单行本)、《普通教育的改革》(*The Reforming of General Education*, 1966)、《工作及其不满》(*Work and Its Discontents*, 1956年初版,1970年新版)、《后工业社会的来临》(*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1973年初版,1976年新版新序)、《资本主义文化矛盾》(*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1976年初版,1978年新版新序)、《蜿蜒之路》(*The Winding Passage: Sociological Essays and Journal*, 1980年初版,1991年新版新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社会科学》(*The Social Science since the Second World War*, 最初于1979年发表于大英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

《今日的伟大思想》1982年出版单行本,中译本易名为《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出版)、《赤字:多大?多久?多危险?》(*The Deficits; How Big? How Long? How Dangerous?*1985)、《第三次技术革命》(*The Thir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 and Its Possible Socioeconomic Consequences*, 1990),等等。此外,贝尔还独自或与人共同主编了许多著作,如:《激进的右翼》(*The Radical Right*,最初于1955年以《美国新右翼》为名出版,再版于1964年)、《走向2000年》(*Toward the Year 2000: Work in Progress*,1968)、《对峙:学生造反和大学》(*Confrontation: the Student Revolt and the Universities*,与克里斯多共同主编,1969)、《今日资本主义》(*Capitalism Today*,与克里斯多共同主编,出版于1970年,再版于1971年)、《经济学理论的危机》(*The Crisis in Economic Theory*,与克里斯多共同主编,1981),等等。正是通过这一系列著作的撰写和编辑,贝尔广泛而深入地分析探讨了当代社会之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中的现象和问题,从而确立了他在学术思想界的崇高地位。而实至名归、步入知天命之年以后,一项项荣誉便纷纷向贝尔飞来:1972年和1983年,他两次受邀为哥根汉客座教授(Guggenheim Fellowship);1977年,受邀担任伦敦大学霍布浩斯纪念讲席(the Hobhouse memorial lecture);1972年至1975年,出任美国艺术和科学院副主席;1986年,受邀担任宾夕法尼亚大学菲尔斯讲座(Fels lecture);1987年,担任法兰克福歌德大学舒尔凯普讲席(Suhrkamp lecture);1992年,获美国艺术和科学院为社会科学设立的塔尔科特·帕森斯奖;同年又获得美国社会学学会颁发给他的终身杰出成就奖;此外,贝尔还先后获得了总数不下于九个的荣誉博士学位。

1990年,贝尔从哈佛大学退休。他没有回到喧嚣繁华的纽

约,而是选择留在了宁静的马塞诸塞剑桥。但贝尔事实上退而未休,他依然活跃于学术界,思敏笔健,常有他的文字出现在报刊杂志上。他的文章既发表在美国,也出现在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墨西哥、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贝尔依然密切地关注着当代世界之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动态,依然殚精竭虑地操着心。

二、价值取向

如前所说,贝尔的价值取向和他的生命境遇有着很大的关联。一方面,作为曾在穷街陋巷中成长、亲历过人间的不平等和社会底层生活的艰辛的“雾都孤儿”,贝尔早年自然而然地亲近马克思主义,热心社会主义;虽然,贝尔作为激进少年拥抱激进的社会主义的时日并不很长,但是,自从13岁的少年贝尔宣布不再信奉上帝而信奉社会主义之后,他便始终没有彻底放弃过他的社会主义倾向,并且始终给马克思的学说予以超乎一般的重视。另一方面,贝尔的犹太血统又使他无法割断同自己悠远的文化传统的血肉联系,并且本能地怀有一种宗教情怀,特别是随着心智的成熟,贝尔越来越深切地感到,惟有绵密深厚的传统,才能提供真正的价值权威和信仰,惟有深切的信仰或者说崇拜(cult),才能提供生命的意义,抚慰人类的心灵和精神。

无疑,按一般的理解,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和基于传统主义的信仰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紧张和冲突:前者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背景之下显然具有激进色彩,而后者则明显带有保守倾向。但贝尔通过两个方面的努力而化解了这种内在的冲突和紧张,从而使它们和平共存于其思想结构之中。首先,贝尔在其思想渐趋成熟以后,对马克思主义采取了“非意识

形态化”处理：50年代之后，贝尔对马克思主义基本上采取了学术研究的态度，一方面非常重视马克思的理论遗产，承认其学说之于现代社会的重大价值，并呼吁要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共同探讨未来的社会制度；另一方面，他在研究发达资本主义演进规律时并不以马克思为准，而是将其思想同圣西门、韦伯、凡勃伦、桑巴特、熊比特等人的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理论作通盘的比较，各有取舍。与此同时，贝尔对现实生活中左、右两个方面的思潮或运动都展开批评：既继承左翼知识界对资本主义实施理论批判的传统，抨击麦卡锡反共、反民主的右翼思潮，又以左翼运动过来人的体验批评社会主义革命的“乌托邦”倾向，主张循序渐进的政治改革和经济平等。其次，贝尔一方面如前所说始终没有彻底放弃他的社会主义倾向，另一方面又从其自己的理论立场出发，对社会主义作了重新定义和限制。在此，贝尔有关经济、政治、文化三大领域相互独立、各自围绕自身的轴心原则运转的观念为他对社会主义的限制提供了理论基础。他把经过他重新定义的社会主义严格地限定在经济领域内。在哈佛，贝尔在他的学生中有一个“圣三一教堂”的绰号，原因就在于他一再这样申明自己的价值立场：“本人在经济领域中是社会主义者，在政治上自由主义者，而在文化方面是保守主义者。”^①

贝尔深知自己在价值取向上的这种奇特组合会引起人们的疑惑，因为不少人都认为，只要某个人在一个领域内激进，他在其他方面也必然激进，而如果某个人在一个领域内保守，他在其他方面也会保守。但贝尔认为这种观念错误地判断了不同领域的性质。在他看来，经济、政治、文化是三个相互独立的领域，各

^①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蒲隆、任晓晋译，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21页。

有自己的轴心原则。因此,贝尔深信自己的观念并不相互矛盾,而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的“1978年再版前言”中,贝尔对自己的上述价值取向作了详细的解释说明。

“我在经济问题上持社会主义立场。”^①但贝尔所谓的社会主义不是指中央集权或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它所论及的是经济政策的优先权问题。贝尔坚持,在这个领域中,群体价值优先于个体价值,前者是经济政策合法性的依据。所以社会资源应该优先用来建立“社会最低限度”,以便每个人都能过上自尊的生活,成为群体的一分子。这意味着应有一套劳动者优先的雇佣制度,有对付市场危机的一定安全保障,以及足够的医疗条件和防范疾病的措施。贝尔对需要(needs)和欲求(wants)作了区分。“需要”是所有人作为同一“物种”的成员所应有的东西。“欲求”则代表着不同个人因其趣味和癖性而产生的多种喜好。社会的首要义务是满足需要。^②贝尔所支持的“社会最低限度”也就是指能满足基本生活要求的家庭收入。当然,贝尔承认,这个限度是一个文化定义,会因时代的发展而变动。贝尔自称是社会主义者,还在于他反对把财富转换成与之无关的领域内的过分特权。他坚称这是不公正现象。他认为,在财富、地位和权力的领域内,存在着各自有别的公平分配原则。

“我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者。”^③ 贝尔政治自由主义立场的

①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23页。

② 贝尔对需要和欲求作出区分并认为社会的首要义务是满足需要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继承和吸取了韦伯对在“形式合理性”支配之下的资本主义经济系统的批判。(参见苏国勋,《韦伯》,载苏国勋主编,《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社会学》[第十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7~88页。)

③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23页。